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4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nual Report of  
Overse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



#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年度报告

# 2014



■ 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 组编

■ 韩 进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4/韩进主编;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组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307-14877-2

I. 海… II. ①韩… ②武… III. 社会科学—研究报告—世界—2014 IV. C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8004 号

责任编辑:陈帆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民政印刷厂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7      字数: 673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4877-2      定价: 118.00 元

---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海外人文社会发展年度报告 2014

### 编 委 会

主 任：韩 进

副主任：骆郁廷

委 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白晓燕	陈 虹	刁 莉	丁 煌	冯 果
冯浩菡	郭明磊	何其生	胡 方	黄德明
黄敏学	黄永明	姜星莉	刘 钊	刘林青
刘穷志	罗国强	马淑杰	莫洪宪	潘 敏
彭红枫	秦前红	冉从敬	沈壮海	王 建
王 胜	肖 军	熊 伟	张万洪	张晓通
庄子银	邹 薇			

# 目 录

## 海外经济学前沿理论 (2013)

——经济增长与“贫困陷阱”问题的近期研究综述

- ..... 邹 薇 方迎风 (1)
- 经济增长、创新与企业规模动态理论最新进展  
..... 庄子银 肖 欢 (55)
- 银行国际化理论发展的前沿追踪 ..... 刁 莉 (83)
- 欧美日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的最新动态研究 ..... 陈 虹 (111)
- 货币国际化研究述评 ..... 白晓燕 (125)
- 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前沿追踪 ..... 潘 敏 唐晋荣 (148)
- 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研究 ..... 王 胜 (178)
- 海外国际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前沿 ..... 胡 方 (204)
- “新新贸易理论”的前沿进展 ..... 黄永明 郑秋婷 (222)
- 社会化商务研究前沿 ..... 黄敏学 肖邦明 王殿文 (237)
- 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新进展：正在涌现的  
“结构”观 ..... 刘林青 (265)
- 收入不平等程度估计研究进展 ..... 刘穷志 (285)
- 西方策略性违约理论及其新发展的前沿追踪 ..... 彭红枫 (311)
- 2012 年欧美国际税法前沿问题综述 ..... 熊 伟 (335)
- 欧美金融法前沿问题追踪 ..... 冯 果 李安安 (363)
- 国际投资条约法的最新发展 ..... 肖 军 (409)

国际知识产权执法研究动态追踪 .....	冯洁菡	(436)
2012 年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主题、进展与趋势 .....	冉从敬 刘 琬 陈 一	(464)
国际民事诉讼法学的热点与前沿 .....	何其生 田新月	(513)
2012 年西方武装冲突法前沿追踪报告 .....	黄德明 徐 奇 崔 森	(541)
俄罗斯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律规制之借鉴 .....	莫洪宪	(571)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宪法保障机制 ——以司法保障为重心的探讨 .....	秦前红 涂云新	(596)
新自然法学派研究综述 .....	罗国强	(638)
法律与发展研究在 21 世纪的新进展 ——论联合国法律赋能理论框架 .....	张万洪 程 骞	(657)
从“科学”到“哲学”：西方行政学价值研究的新发展 .....	丁 煌 张雅勤	(679)
西方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张晓通	(699)
国外群体智能研究综述 .....	刘 钒 周 璇	(723)

# 海外经济学前沿理论（2013）

——经济增长与“贫困陷阱”问题的近期研究综述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邹 薇 方迎风

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如何有效地减少和消除贫困是一项严峻和迫在眉睫的任务。自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把减少贫困、提高收入水平与缩小收入差距等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从贫困的识别与确定、贫困的测度与动态跟踪、贫困产生的原因与机制，到扶贫政策的优化选择以及扶贫政策效应的评估等，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不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国，贫困问题都依然非常严峻，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问题，如何有效地测度和评判贫困状况，如何更深入地揭示持久性、区域性贫困的形成机制，如何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题。

目前，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已经大为减少，但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一方面，“极端贫困”的分布主要向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集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仅贫困范围广、程度深，而且贫困下降速度十分缓慢，在遭遇外部冲击时，贫困现象甚至上升；另一方面，减少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最新数据表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全球 2/5 的贫困人口（按每人每天支出低于 2 美元计）生活在中等收入

国家。联合国开发署提出，未来全球反贫困的主战场将是中等收入国家。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表明，“新的底层 10 亿”主要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预计到 2015 年，将有 55% 的贫困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Gertz & Chandy, 2011）。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为众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间，已经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可以预见，缩小收入差距和消除贫困仍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贫困尽管看上去明显，但又是严肃而不得不探讨的问题。正如 Sen 在《贫困与饥荒》这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的。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分析方法……但是，并非所有关于贫困的事情都是如此简单明了。当我们离开极端的和原生的贫困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甚至对于贫困的判断都变得模糊不清”<sup>①</sup>。我们在取得显著的扶贫成绩时，贫困却依然始终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对贫困的认识似乎已经在理论研究中处于定型，但是为了能更准确而有效地进行扶贫，探寻合理的贫困确定方法与研究贫困始终存在的原因还有漫长的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

本文将围绕经济增长与应对贫困问题，对近年来各国学者所展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综述和评议。我们的综述主要有以下几条线索：一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区域性贫困，以及所谓“贫困陷阱”的新研究，将通过世界各国和我国历年贫困的地域分布和动态变化状况，阐述现阶段贫困的地域集中性、脆弱性和持久性等特征；二是关于贫困的识别与测度问题的新研究，将探讨贫困测度由单个维度（即只考虑收入或消费水平）向多个维度的演变，并具体比较不同测度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三是探讨各国扶贫政策的制定及其效力问题。

<sup>①</sup>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1 页。



# 1 经济增长与区域性贫困

## 1.1 收入差距与贫困分布的特征化事实

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重要力量，但是否将焦点只关注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上，贫困将会因经济增长而自然地被消灭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完全被穷人获取，实质上穷人能从经济增长获得的利益较富人来说非常低。Fosu (2009, 2011), Kalwij & Verschoor (2007), Adams (2004) 等的很多研究也显示，不平等是阻碍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处于停滞，致使当前世界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出地区性集聚现象。

由图 1 可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人口在整个世界中的比例由 1981 年的 11.27% 上升到 2005 年的 28.37%，南亚地区从 28.92% 上升到 43.26%，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则从 56.51% 下降到 22.97%，但是，其中主要是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下降带来的。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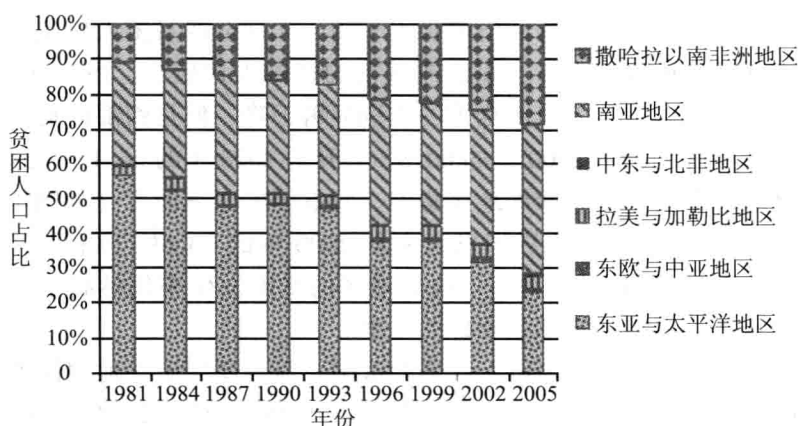


图 1 世界贫困人口分布 (贫困线: 1.25 美元/人天)

数据来源与地区界定: Chen & Ravallion (2010)

刻画了不同地区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从中可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比较缓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一直处在50%以上,南亚地区则处在40%以上,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贫困发生率由1981年的77.7%下降到2005年的16.8%,同样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贫困人口数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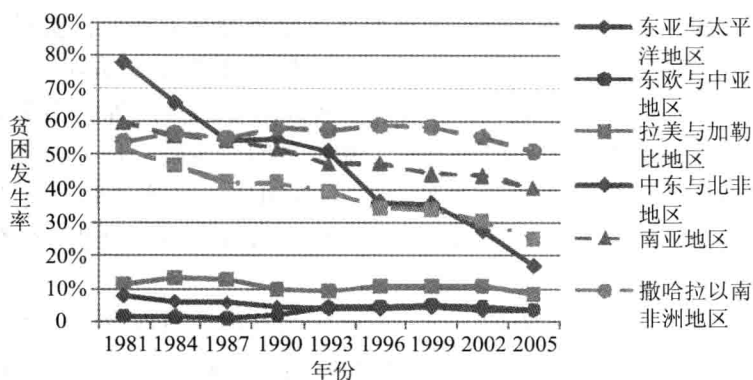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各地区贫困发生率 (贫困线: 1.25 美元/人天)

数据来源与地区界定: Chen & Ravallion (2010)

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大部分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或农村,东部或城市的贫困人口较少。图3显示,中国东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显著下降,但是西部的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60.8%上升到2008年的66.1%,这表明贫困现象更多地向西部地区集中。就贫困发生率而言(如图4所示),尽管西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20.6%下降到2008年的9.3%,但到目前为止,西部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东部和中部的水平。

从更具体的分布来讲,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封闭、偏远、经济落后等地区,尤其是地处山岭的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也将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作为未来十年扶贫的重点工作来抓。这种区域性贫困的聚集也反映了地区发展存在的贫困陷阱,并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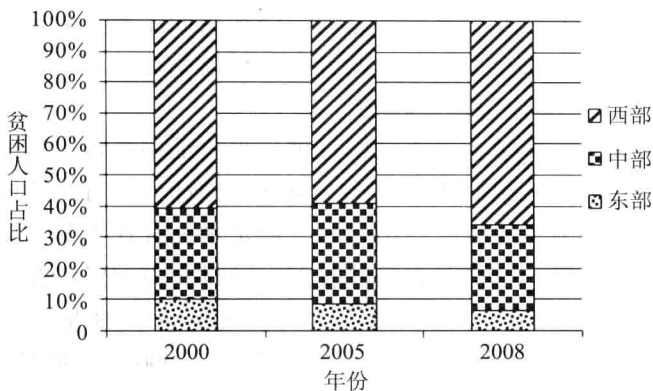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贫困人口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评估总报告》

注：贫困线为2008年调整的新贫困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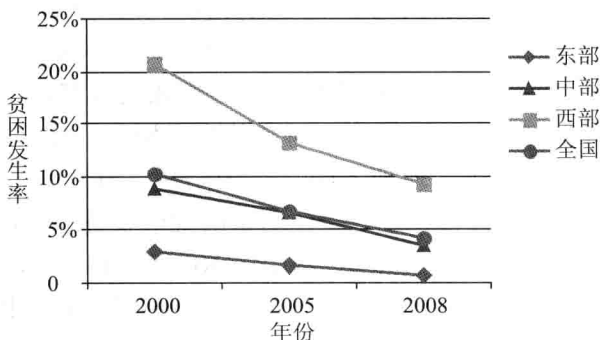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各地区贫困发生率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评估总报告》

注：贫困线为2008年调整的新贫困线。

出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不断扩大。因此，为了提升扶贫效率，有一大批文献从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来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

### 1.2 区域性“贫困陷阱”的理论研究

“贫困陷阱”理论是一种研究区域性贫困集聚与地区发展差距的理论体系。“贫困陷阱”理论有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分。宏观

层面主要研究地区发展落后的原因，微观层面主要是分析个体陷入持久性贫困的现象与原因，但两者的分析体系是一致的。

### 1.2.1 “贫困陷阱”理论

近年来，许多学者基于新增长理论来验证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问题，尽管所采用的计量模式、数据结构和处理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各地区间在增长和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但是存在条件收敛；同时，中国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而人力资本（技能劳动）则是导致地区间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蔡昉、都阳，2000；沈坤荣、马俊，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邹薇、周浩，2007；姚先国、张海峰，2008；Zou & Zhou, 2007, 2008；Zou & Liu, 2010, 等等）。然而，以上研究使用的都是省级面板数据，正如 Jalan & Ravallion（2002）指出，加总的地理数据虽然可以检验“贫困陷阱”的存在，却难以区分增长和收入水平“大分叉”（great divergence）的原因究竟是来自个体财富的增长，还是来自地理上的外部性。Jalan & Ravallion（2002）在消费增长的微观模型基础上，使用微观户面板数据，研究区域资本对个体自身资本的生产率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地理上的“贫困陷阱”在中国农村地区是存在的，地理上的外部性以及个体财富的规模收益递增可能是导致地区间增长和收入水平大分叉的原因。Knight, Li & Deng（2010）则强调教育落后是造成中国农村形成“贫困陷阱”的原因。

之所以出现区域性贫困陷阱，通常是由于存在各种“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机制（Azariadis, 1996, 2004；Bowles, Durlauf & Hoff, 2006）。其一，因历史原因或地理位置偏远，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贫乏，外围的现代产业部门扩散效应对这些地区影响有限，居民局限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因此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其二，因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较高、程度较深，极大地妨碍这些地区的发展，而经济落后又反过来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会进一步限制该地区下一期的经济发展。其三，由于与外界的相对隔阂，农村个体所获得信息受到很大约束，社会关系网络局限于当地，农村的许多家户还因户籍制度等限制而不愿改变当前

的状态，因为农村贫困居民要谋求改变就得付出很高的成本，面临很大的风险。Hoff & Sen (2004) 也指出，在一些落后地区，传统的亲缘关系系统 (kin system) 代替正规部门来提供一些社会服务并分担个体风险，但正是这些关系系统也阻碍着系统中成员向现代部门转移。由于社区网络外部性，少数个别成员的流动很难冲破既有的亲缘关系系统的障碍，并形成现代部门网络；再加上农村居民居住分散，系统中成员之间的协调存在不一致性，使得农村居民选择留在传统农业部门，由此陷入低水平均衡的“贫困陷阱”。

### 1.2.2 从“外部性”到“邻里效应”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机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Solow (1956)，Swan (1956) 等人提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模型，但是该模型却是在规模报酬递减的框架下，用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技术”视为外生，但不能解释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扩大这一现象 (Mankiw, Romer, Weil, 1992 等)，因此，该理论很快就被 Lucas, Romer 等人的新增长理论所取代，该理论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技术”内生。在新增长理论等中，除了强调技术的内生外，非常强调公共支出或私人投资的“外部性”，Romer (1986, 1990) 利用引入私人投资的外部性来引入规模报酬递增，他借鉴 Arrow (1962) 边干边学模型将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设为如下形式：

$$Y = F(A, K, L, \kappa) = AL^\alpha K^\beta \kappa^\gamma \quad (1)$$

其中， $K$  为私人资本， $L$  为劳动， $A$  为技术， $\kappa$  为整个经济的总资本，模型的关键是强调总资本与私人资本或劳动的互补性，或总资本  $\kappa$  带来的外部性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Barro (1990)，Getachew (2008) 则强调公共支出所带来的外部性，他强调了资本的生产与资本的积累都受到公共支出的影响。他将生产函数设成： $Y = AK^\beta g^\gamma$ 。其中， $g$  代表政府的公共支出。Murphy, Shleifer & Vishny (1989) 也是强调这种公共投资外部性的重要性。但是，不管是这里私人投资带来的外部性，还是下面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都可能会使竞争性均衡无法达到社会最优，产生的问题一般是投资不足，不过可以通过补贴等方式使竞争性均衡与社会最优相一致。

Lucas(1988, 2004), Tamura(1991)则认为不仅物质资本可以积累, 人力资本同样可以积累, 他们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 并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 与前面的模型不一样的是, 他们认为人力资本不是外生的, 而是通过投资进行积累的, 因此,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架构是:

$$Y = AK^\beta [uhL]^\alpha h_a^\gamma \quad (2)$$

$$\dot{h} = \phi h(1-u) \quad (3)$$

其中,  $u$  是个人用于生产活动的非闲暇时间比例,  $h$  是个人的人力资本,  $h_a$  为经济体内部平均人力资本。 $h_a^\gamma$  表示平均人力资本的外部性。Tamura(1991)与 Lucas(1988)不一样的地方是, 假设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影响, 即将(2)式中的  $h_a^\gamma$  放入(3)式。Lucas(2004)利用城市中这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来研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

Agenor(2011a, 2011b)则将人力资本与公共资本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中, 并将政府的公共投资分成了不同类型, 并强调公共资本的外部性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它的框架如下:

$$Y = K_c^\alpha K^\beta h^\gamma \quad (4)$$

$$\dot{h} = h^{1-m-n} K_c^m G_h^n \quad (5)$$

其中,  $K_c$  是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资本,  $G_h$  是用于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 Agenor(2011a)中  $G_h$  是用于健康的投资(如医院、保健设施等), 他分析这类资本投资与健康以及“贫困陷阱”的关系, Agenor(2011b)中  $G_h$  则是教育的投资(如学校)。

Benabou(1996)在 Tamura(1991)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考察了社区结构的外部性对于收入“分层化”和“极化”的影响, 他的主要框架是:  $h_{t+1}^i = \Theta \xi_t^i (h_t^i)^\alpha (N_t^i)^\beta (H_t)^\gamma$ , 即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家庭( $h_t^i$ )、社区( $N_t^i$ )、总体经济因素( $H_t$ )、个体冲击( $\xi_t^i$ )以及其他的参数( $\alpha$ 、 $\beta$ 、 $\gamma$ )的影响。在 Benabou(1996)中, 社区的因素( $N_t^i$ )与家庭( $h_t^i$ )的社区分布有关, 总体经济因素( $H_t$ )与家庭( $h_t^i$ )的总体分布有关。

Galor & Tsiddon(1997)则指出, 人力资本的分布通过两种路径

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一种是“局部家庭环境外部性”(local home environment externality),即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是父母人力资本水平(类似于 Benabou(1996)中的  $h_i^j$ )的一个增函数;另一种是“全局技术外部性”(global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即技术进步与社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是正相关的,即技术  $\lambda$  是 Benabou(1996)中总体经济因素( $H_t$ )的一个增函数。如果前一种外部性是主导因素,则收入分布将会出现“极化”,通常这会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全局技术外部性会占主导地位,致使收入水平出现收敛。因此,存在一个“门槛外部性”(threshold externality),由  $\lambda(H_t)$  决定,即存在某个时间点,平均人力资本超过某一阈值,技术由低水平跳跃到某个高水平,随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将会降低。关于外部性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式,它从一个侧面考察了“群体效应”对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也为后文建立实证模型,从群体效应的角度探讨“贫困陷阱”的根源提供了理论基础。

众多研究表明,“群体效应”(group effect)<sup>①</sup>是导致“贫困陷阱”的一个关键原因。所谓“群体效应”起初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中提出的,是指个体行为会受到群体(社区)内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对个体选择产生影响的有父母的行为、社区内基础设施、社区生活和文化环境、同辈个体的相互作用等。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差异的因素包括压力、社会变迁、群体一致性的程度等。一方面,在贫困群体(社区、邻里)中的生活会对个体的经济自立、生活习惯、认知能力等产生影响(Wilson, 1987);另一方面,社区的文化和结构会受到经济群集性和种族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Sampson, 2008; Bruhn, 2009)。群体效应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背景

<sup>①</sup> 在不同研究背景下,“群体效应”(group effect)又被称为“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社区效应”(community effect)、“内生的社会效应”(endogenous social effect)等,它是指个体行为会受到群体(社区)内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如父母的行为、社区内基础设施、社区生活与文化环境、同辈个体等,因此,文中这几个名词不作区分。

下,具体又可分为:同群内生效应(peer endogenous effect)、关联效应(correlated effect)、情景外生效应(contextual exogenous effect)、社会学习效应、社会互补效应等(Manski, 1993; Durlauf, 2001)。

借鉴“外部性”理论,许多学者( Ioannides & Zanella, 2008; Graham, 2009)也将外部性理论研究框架引入邻里效应与个体行为结果的研究中来,则个体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下式:

$$\dot{h} = g(h, x, h_n, x_n, y_n) \quad (6)$$

其中,  $h$  表示个体的人力资本,在实际研究中可以是子女的教育、健康投资,  $x$  是个体或家户的其他特征,  $h_n$  是社区内其他家户的平均人力资本,  $x_n$  是社区内其他家户的平均特征,  $y_n$  是社区内其他家户的平均收入。结合个体的效用函数  $u(c, E(c'))$ 、个体的生产函数  $Y=Af(h)$  以及家户面临的物质约束,则可以得到邻里选择的最优结果。稍作调整也可以获得邻里效应分析的另一种框架是,  $\omega_i = \operatorname{argmax}_{\omega \in \Omega_i} V(\omega_i, x_i, x_n, \mu_i^e(\omega_{n,-i}), \varepsilon_i)$ 。其中,  $\omega_i$  是个体自己的选择,  $\omega_{n,-i}$  是社区内其他人的选择,  $\mu_i^e(\omega_{n,-i})$  则是个体  $i$  所掌握的关于社区内其他人选择的一种信念,即其他人选择的概率,  $x_i$  是个体具备的一些特征,  $x_n$  则是社区的既定特征,  $\varepsilon_i$  是个体随机获得的一些特征,  $x_n$  和  $\mu_i^e(\omega_{n,-i})$  则体现了邻里效应。Durlauf(2004)将  $x_n$  称为情境效应(或环境效应),将  $\mu_i^e(\omega_{n,-i})$  称为内生效应,为了使模型完整,则假设信念是理性的。如果要利用现有的数据来对此思路进行实证分析,则一般的实证分析模型可写为:

$$y = \alpha + \beta_1 h + \beta_2 h_n + \beta_3 x + \beta_4 x_n + \varepsilon \quad (7)$$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  $y$  是结果变量,它可以是收入、就业、健康等个体行为的选择,其他的解释变量的含义与(6)式是一样的。(7)式只是一个简略模型,具体问题还需要修正,但由于内生性问题,这种邻里效应模型的识别很是麻烦,不过,最近的很多文献(Brock & Durlauf, 2007; Kasy, 2010 等)还是对此技术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行的办法。

近年来,经济学界越来越关注从群体效应的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和持久贫困问题。Manski(1993)研究了内生的社会效应如何对经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影响；Drukker(1999)研究了邻里效应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底层群体更趋贫困的机制；Brock & Durlauf(2002)和 Durlauf(2004)研究了邻里效应是如何导致不同群体分隔、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底层群体陷入“贫困陷阱”的。他们都认为在探讨贫困的发生和持续时，必须看到个体的收入水平、经济状况显著地受到其生活过的群体特征的影响，包括居住地及邻里关系、所在学校及企业等内生的群体因素和性别、民族等外生的群体因素。Ioannides & Loury(2004)研究了邻里效应通过就业信息网络的差异进而导致群体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机制。还有的研究者则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或空间计量模型，试图将邻里效应和群体异质性特征纳入实证考察中(如 Duncan & Jones, 2000; Dietz, 2001; Alexander, 2011)。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就群体效应对于区域性持续贫困或“贫困陷阱”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 1.3 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经验研究

经济增长是促进人们生活改善，脱离贫困的主要因素(Ravallion & Chen, 1997; Dollar & Kraay, 2002)，因此，一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有很多，大致有制度(Acemoglu, 2002, 2005; Bowles, 2006)、贸易(Bhagwati & Srinivasan, 2002; Winters, Mculloch & McKay, 2004)、金融发展(Greenwood & Boyan, 1990; Honohan, 2004)、公共投资(Barro & Sala-I-Martin, 1992; 邹薇、张芬, 2006)、人力资本投资等，而中国扶贫开发早期阶段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也归结为各项制度的变革(Ahmad & Wang, 1991)。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这种宽泛的扶贫方式的作用力不断下降，很多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导致经济增长扶贫作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Ravallion, 2005; 万广华、张茵, 2006; 林伯强, 2003等)。不平等的作用路径有一种是通过妨碍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居民生活水平变差(Persson & Tebellini, 1994)，另一种是贫富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并不相等，富裕者更有能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陈立中、张建华(2007)也指出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越强；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扶贫能